

革命、海爾維第共和國、調解時期與復辟—— 概述與總結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1798 年 6 月 5 日，法國士兵打開了蘇黎世大教堂（Grossmünster）下方的金庫——行會共和國一直在此存放其鑄幣儲備——並將其中的財物搬走。整個行動只用了幾個小時。它終結了這座城市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奉行的財政審慎傳統，而這一傳統曾被歐洲各地的同時代人視為一個治理良好的新教共和國的標誌之一。三十多年後，1830 年 11 月 22 日，約一萬名來自蘇黎世鄉間的男子聚集在烏斯特（Uster）上方的一座山丘上，要求制定一部城市不再統治鄉村的憲法。在這兩個日期之間，發生了法國入侵、在蘇黎世城內及周邊進行的兩場戰役，以及一個試圖以稅收取代什一稅卻以失敗告終的單一制海爾維第國家。同一時期還出現了一部由拿破崙欽定的憲法、一場以處決告終的農民起義、貴族統治的復辟，以及最終的一場自由主義革命——它賦予該州一套法律秩序，其現代經濟和金融機構正是在這一秩序下成長起來的。¹

本章追蹤蘇黎世的財富和制度在這一連串動盪中的命運。本章論述這一時期的政治史，僅限於政治決定了誰可以擁有財產、從事貿易、放貸和徵稅的範圍之內。對於一個金融中心而言，1794 年至 1839 年這幾十年在一個確切的意義上具有奠基性。它們瓦解了舊商人貴族賴以積累財富的法律特權，首先是城市市民在貿易和

製造業上的壟斷。它們開啟了將土地上的封建負擔折算為貨幣並予以清償的漫長進程，從而創造了現代信貸體系所需要的、無負擔且可抵押的財產。它們將公共財政的基礎從什一稅和地租轉向稅收。在拿破崙封鎖的壓力下，它們催生了第一批機械化棉紡廠以及由此發展起來的機械工程企業，同時還造就了一個自由派實業家階層，而正是這些人創辦了下一代的銀行。此外，它們還在1831年賦予蘇黎世一部明文保障貿易自由和財產不可侵犯的憲法。

這個故事還有第二個主題，即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關係。1798年以前，蘇黎世是一個城市國家：一座約一萬一千居民的城鎮的市民，統治著一片擁有一十八萬餘名臣民的領土。² 城市的財富部分建立在將農村企業家排斥在最有利可圖的商業形式之外的特權之上。這一時期幾乎每一場衝突——從1794年的施泰法備忘錄（Stäfner Memorial）到1830年的烏斯特集會日（Ustertag）——都圍繞著這一關係展開。以法律平等為方向解決這一關係，為金融中心所在的現代州開闢了道路。與日內瓦的比較（見本書姊妹卷）頗具啟發性：日內瓦於1798年被法國吞併，作為法國的一個省經歷了革命時期；而蘇黎世則是作為一個瑞士國家的成員度過這一時期的，該國家的形態在三十三年間變更了四次。本部分前面幾章描述了包買制與商人銀行家（第C.I章）以及國家投資機構Leu & Co.（第C.II章），而瑞士法郎和1848年的聯邦國家則在第C.IV章中論述。

1 註釋

1. Staatsarchiv des Kantons Zürich（編），Kleine Zürch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1218–2000（蘇黎世：Chronos，2000），第35頁，https://www.zh.ch/content/dam/zhweb/bilder-dokumente/themen/politik-staat/recherche-im-staatsarchiv/z%C3%BCrcher-geschichte/zh_verfassungsgeschichte.pdf。該文指出，第一批法國軍隊於1798年4月27日進入蘇黎世，國庫於1798年6月5日被強行從大教堂金庫中搬走。

2. Wikipedia（德語版），“Verfassung des Kantons Zürich”，
https://de.wikipedia.org/wiki/Verfassung_des_Kantons_Z%C3%BCrich，其中給出約 1803 年城市約有 11,000 名居民、鄉村約有 182,000 名居民。

2 結語

革命時期摧毀了舊蘇黎世，併為新蘇黎世創造了條件。1794—1795 年的施泰法事件（Stäfer Handel）表明，因紡織貿易而致富的農村精英，不再接受一部將其排斥在政治和最有利可圖的商業形式之外的憲法。1798 年法國入侵奪走了國家的現金儲備之後，1799 年的戰爭又以徵用和破壞的方式消耗了遠多於此的財富。海爾維第共和國廢除了城市的特權，宣佈贖買封建負擔，並試圖建立一個現代稅收國家和統一貨幣，但因缺乏資金和民意支持而失敗。調停時期（Mediation）將該州恢復為一個由財產所有者統治的國家，將州的財產與城市的財產分開，並以處決鎮壓農民起義，強制推行什一稅的贖買。在拿破崙封鎖的保護下，第一批機械紡紗廠以及 Escher Wyss 的機械工程企業相繼創立。復辟時期使城市重新取得政治主導地位，卻無法恢復其經濟特權。與此同時，以 Heinrich Kunz 等企業家為代表的農村新興工業財富，已發展到城市無法控制的程度。

1830 年 11 月 22 日的烏斯特集會日和 1831 年的憲法，以法律平等為方向解決了城鄉之間的衝突，並在憲法中明文保障了蘇黎世的貿易自由、財產不可侵犯以及贖買封建負擔的權利。1830 年代的自由派政府改革了法院，創辦了大學，拆除了城防工事，並保護新機器的所有者免受焚燒機器的織工侵害。1839 年的“蘇黎世政變”（Züriputsch）中斷了自由派政權，但並未推翻其經濟安排。到 1848 年蘇黎世加入聯邦國家之時，它已具備了法律秩序、工業基礎、新的企業家精英以及第一家股份制銀行，十九世紀下半葉的金融中心正是由此成長起來的。

3 五句話概要

1. 1794 年的施泰法備忘錄及其在 1795 年遭到的嚴厲鎮壓，表達了富裕農村精英對政治平等、貿易自由和廢除什一稅的訴求，併為 1798 年 2 月城市統治的崩潰埋下了伏筆。

2. 1798 年法國入侵後，蘇黎世約 622,000 里弗爾的國庫於 1798 年 6 月 5 日被從大教堂金庫中搬走；此後，佔領以及 1799 年的兩次蘇黎世戰役所帶來的徵用和破壞遠遠超過了這一數額。

3. 海爾維第共和國終結了城市市民的商業特權，暫停徵收什一稅並下令贖買，並試圖以現代稅收取代封建收入、以瑞士法郎取代各州鑄幣，但均未成功。

4. 1803 年的調停法案將蘇黎世恢復為一個由財產所有者治理的州，在州與城市之間劃分公共資產，鎮壓了 1804 年因什一稅贖買而爆發的“博肯戰爭”（Bockenkrieg），並在大陸封鎖的保護下見證了第一批機械紡紗廠的創立——Hard 紡紗廠（1802 年）和 Escher Wyss（1805 年）。

5. 自 1814 年起的復辟時期使城市貴族重新掌權，此後 1830 年的烏斯特集會日和 1831 年的憲法確立了法律平等、貿易自由和財產不可侵犯；而 1830 年代的各項改革——從高等法院（Obergericht）到 1833 年的大學以及 1836 年的 Bank in Zürich——為現代金融中心奠定了制度基礎。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

網 上 版 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revolution-helvetic-republic-mediation-and-restoration-overview-and-summary